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的多维审视

薛金慧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2)



摘要 优秀农耕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鲜明标识和宝贵财富。“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从价值意蕴看,延续了民族记忆,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理论,增添了乡村治理智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从本质过程看,传承发展的过程是充实马克思主义文化生命体、传统与现代互动对接、价值再创造和全面探索中国特色乡村文化振兴道路的过程;从现实困境看,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面临认同危机、激活传统生命力困难、“双创”不足和手段单一的问题。因此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整合多元主体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文化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将德治约束与机制完善结合;坚持与时代同行,创新文化传承发展手段。

关键词 “第二个结合”; 优秀农耕文化; 传承; 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5)05-0128-11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5.05.011

传统是现代化的生长点。作为一个内源性后发现代化国家,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关系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影响乡村治理成效和农民性格塑造,是赓续中华文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命题。“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的基本遵循,指明了传承中推进文化创新的思想方法。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农耕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优秀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丰富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优秀农耕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发展问题、保持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独特性、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的价值意蕴

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农耕文明的物质基础和伦理本位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关于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的观念反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以“第二个结合”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场域和中国特征,彰显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具有极强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时代价值。

1. 历史价值:延续民族记忆

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华民族已经开始了农耕生产,《论语·宪问》中就有“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的记载。在农耕社会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耕文化,一经产生就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尽管传统文化也吸取了牧业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但由于农业生产的

收稿日期:2024-10-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原创性贡献研究”(23&ZD004);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文化困局的斗争策略研究”(2023B002);西北工业大学2025年度共青团工作研究项目“新时代高校共青团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和路径研究”(2025GQT07)。

基础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吸收便都以能否适应农业文明的需要为前提。”^[1]农耕文化记录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社会心理等丰富内容。栽培技术、耕作方式、节气与农时等农业生产智慧,古村落、农用器具等物质遗产,乡规民约、民俗风情、民间艺术、饮食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唤醒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历史、了解国情的重要基础,更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与此同时,稳定和谐、重伦理道德的农耕文化特点,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等等,作为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人的成长和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优秀农耕文化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基因。

只有传承和发展好这份软实力,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保留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和价值追求,明确前进的方向;才能做到使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让文化根脉生生不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2]置身中国式现代化的场域中,更好延续民族记忆,需要从本质层面对农耕文化进行剖析,坚持“第二个结合”,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优秀农耕文化的宝贵资源,使优秀农耕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激发优秀农耕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赋能。

2. 理论价值: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体系中,虽然没有直接关于农耕文化的论述,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本质上是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是人类超越自然、在特定生产方式下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综合。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文化具有鲜明的传承性。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都是在前一个时代的基础上产生的,受到传统文化的规定、影响,“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3]既然传统文化是文化产生发展无法选择和摆脱的基础,那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恩格斯又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英文版导言中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4]这里的摧毁,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传统文化。马克思指出:“问题绝不是要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对它们进行批判,要把那些在错误的、但对于那个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的形式内获得的成果,从这种暂时的形式中剥取出来。”^[5]“剥取”实际上就是在承认传统文化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采取批判的、辩证的观点,挖掘其优秀内核继承,放弃其消极因素,即“扬弃”。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指出:“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6]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认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有封建主义的、反封建主义的、也有人民的内容,批判地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才是正确态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剥取”、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利用”思想的基础上,立足新时代新实践,反复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强调必须加强对包括优秀农耕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理论创新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高度自觉”^[7]。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优秀农耕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不仅能够形成与西方农业农村现代化截然不同的乡村文化振兴理论,而且能够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扎根新时代中国农村的“泥土”,实现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理论的创新升华,解决乡村文化治理难题,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行动指南。

3. 实践价值:增添乡村治理智慧

农耕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文明之中,体现的是前现代社会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和社会心理等历史属性,同时又包含了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积极因素和内容。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农耕文化相结合,传承发展农耕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抛弃其落后的、过时的内容,二者相结合产生的新

的文化生命体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取之不竭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治理智慧。首先,增添乡村社会治理智慧。在传统农耕社会,皇权不下县的治理体系下,依靠血缘、地缘、集体共同意识形成的乡村社会,主要依靠软性的德治、乡绅精英自治模式维系。具有普遍集体认同的统一秩序有效规避了小农生产条件下的生存风险,构建起抵御自然灾害、外来侵袭等的互助帮扶机制、熟人社会中道德约束机制、生产力低下形成的集体合作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等,由此,“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与乡土逻辑成为关系型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和核心表达。”^[8]这种德治、自治的文化传统为现阶段实现农村内源式发展提供了借鉴。其次,增添乡村经济治理智慧。农耕文化诞生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出于生存需要,农耕文化十分重视对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土地的精耕细作以保证最大程度的使用效率,注重通过多元化种植提高抗风险能力,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农耕生产经营智慧和农耕技艺,直到今天对于农业生产、农业现代化、科学农业种植、合理利用土地、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增添乡村生态治理智慧。尊重自然、崇尚自然、强调人与自然是农耕文化的显著特色。马克思强调:“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9]农耕文化按照“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观、节俭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观,顺应自然规律,用养结合、因地制宜进行农业生产生活。在此基础上,农耕文化还强调农业生产的循环可持续发展。例如,通过轮作复种、间作套种等种植制度,实现对土地的长期利用和资源的可持续开发,这对于现阶段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4. 时代价值: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10]这一论述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表明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优方案,更加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基本要求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农村的具体实践。“乡风文明”揭示了中国式农村现代化是以文化作为底蕴的,而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深入挖掘优秀农耕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着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农耕社会的知识智慧、延续不断的德性传统,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赋予了现代化最深刻的内在规定性,开创了现代化道路的新范式。

首先,勤劳务实的文化传统保证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自古以来,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常年辛勤劳动,看重劳动,赞扬劳动,养成了勤劳务实的优秀品质。《国语·晋语》就有“华而不实,耻也”的说法,王符在《潜夫论·叙录》中也谈到“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农耕社会,讲求有耕耘才有收获,广大的农民能够维持低水平的生活,靠的就是勤劳务实的美德、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勤劳务实、凡事重实际轻幻想、脚踏实地的文化传统。这种美德和精神经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与新时代劳动价值观相结合,必然成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极大地激发农民求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其次,追求和谐的价值取向保证了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和谐共生的特点。翻开西方农业农村现代化历史,不难发现,“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零和博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农耕文化,历来奉行的是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农耕社会中的农民,生产生活圈子狭小,交往范围一般只限于亲属和近邻之间,通常不出县界,“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农村就是农民的整个世界。根据地缘基础建立起来的邻里关系就是除了血缘关系以外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特别强调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中湘甘氏族谱》(《家训·睦族党》)中记载:“至者邻里,比屋联居,非亲即友,亦宜有无相通,患难相顾,以让救争,以礼止暴,仍成仁厚之风。宗族和顺,乡党亲睦,自无盗贼凶恶之徒为之滋扰矣。”这样,农民的价值追求,就外显为人际礼让、宽厚处事的生活态度,以实现自己对家族和邻里的责任;内化为宽仁克己、平和宁静的心态,以取得家族和邻里对自

我的良好评价,当然,这里的和谐取向带有封建宗法礼治的色彩。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场域下,将和谐传统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公平、正义本质要求结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秉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推崇“以和为贵”理念,倡导和平共处、团结互助、和睦友好、和谐共生的追求,乡村振兴就具有了鲜明的理念特色和独特优势。

最后,国家至上和集体意识保证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经济社会,以家庭和小生产为基本生产方式,只有注重集体和家族的力量,才能抵御自然灾害和偶发因素,从而导致了农民对乡土和家庭的强烈依赖。国与家的组织结构、社会功能和意识等在农耕社会有很多类似之处。家规族法与国法律令互为补充,共同发挥作用。这样,民众对家庭的依赖感和责任感就演变为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家国观念、集体意识可以说是优秀农耕文化的核心要素,至今仍发挥重要影响。这种理念遵循“第二个结合”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至上理念和人的现代化目标相结合,在发挥农民主体性的前提下,保证了农民与中国共产党、国家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在现阶段体现为广大农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全认同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全力支持国家解决“三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二、“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的本质过程

优秀农耕文化是古代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的观念反映,存在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经长期积淀,成为塑造农民性格、治理乡村社会和破解现代社会难题的文化资源。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需要从“第二个结合”的视域进行科学系统的理解。

1. 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的过程是充实马克思主义文化生命体的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思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拓展深化,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鲜明标识,意味着新时代更加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对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二者的结合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即“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新的文化生命体是“第二个结合”的必然结果。

优秀农耕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形态上来看,主要是伦理型文化,相对侧重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以道德秩序建构和谐共生的社会,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核和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探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它以其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二者虽然质态不同,但在内容上具有契合性。例如,农耕文化中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轮作耕种、“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循环观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的美好追求,勤劳务实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家国情怀、集体至上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等等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2]把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农耕文化相结合,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中的具有时代价值的积极元素,推动优秀农耕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让经由“结合”后生成的文化成为一个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有机统一体,从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一部分,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生命体。

2. 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是传统与现代互动对接的过程

传统的文化样态在现代语境下如何维系自身,其实是文化发展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回答好的一个问题。一味固守传统、墨守成规,必然会走向僵化,则文化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反过来,当文化在强大的时代潮流冲击下完全放弃传统,放弃自身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类特征”,则也失去了存在的价

值。文化传承发展中,传统与现代不可能截然分开,一定会兼而有之。传统只有在与现代的互动、对接、交融中才能不断更新自身。传统是每个民族历史的延续,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当前,还会存在于未来。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形态,而是流动的形态。德国哲学阐释学开创者伽达默尔指出:“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传承物才向我们呈现出来。”^[13]说明传统是一个流动的、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传统的流动性推进,实质上就是传统不断走向现代的过程。

优秀农耕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和重要组成部分,虽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但非固定静止的永恒之物。它不是只停留于过去的僵化的文化形态,而是流动的、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晶,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为优秀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价值遵循。当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冲击、改造和重建优秀农耕文化之时,现代视域和现代意识为优秀农耕文化注入新活力,为优秀农耕文化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虽然现阶段乡村社会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农村的乡土本色、农民的乡土观念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优秀农耕文化依然存在于农民的心灵记忆和情感表达之中,表征着农民的现实生存样态和理想价值追求^[14]。基于此,可以说优秀农耕文化标定了新时代场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发展的民族形式和现实特征,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农耕文化结合,深入挖掘优秀农耕文化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在时代发展、实践需要的现实中建立一种动态的为我逻辑”^[15],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农耕文化之间的张力、鸿沟,最终才会得以消解和逾越。

3. 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是优秀农耕文化的价值再创造过程

价值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是客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相较于其他民族的独特魅力和价值。不断展示和实现这些魅力价值,本质上是民族文化自信、成熟的体现,是文化主体性获得深度自觉的标志。优秀农耕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形态,现阶段对其传承发展,实质上就是彰显、实现和再创造优秀农耕文化价值的过程。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秉承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既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又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价值。

没有价值创造,就谈不上传承,更谈不上发展。众所周知,农耕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时期形成的,它对传统中国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古代辉煌的历史成就等发挥了重要价值。但也要看到,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有其鲜明的历史特质和相对合理性的边界^[16]。农耕文化中迷信权威的天命意识、家族本位的宗法观念、经验务实的思维习惯、封闭保守的行为方式等等早已为现时代所抛弃。然而,和合共生的文化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求真务实的实践观念、耕读传家的家庭美德、诚信守礼的处世规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农耕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批判与继承中依然表征着现阶段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诉求,能够通过“第二个结合”的根本方法,经过主体的加工改造,丰富农村精神文明资源,提供物质发展的精神动力,增添乡村治理智慧,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度选择和制度效率。这实质就是让民众再创造优秀农耕文化价值的过程,或者是优秀农耕文化的“当代价值”被民众发现的过程。

4. 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的过程是全面探索中国特色乡村文化振兴道路的过程

世界各国乡村治理实践和党的历史经验表明,乡村文化建设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立足时代特点,根据不同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不论是英国以历史传承、环境保护、经济多元化和社区参与为核心的综合发展道路,还是美国融合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科技创新和法律保障等多维举措的模式,都是立足自身实际的政策选择。中国是一个内源性后发现代化国家,其强国战略、复兴之路包括乡村文化建设等因民族的历史文化性格和价值追求决定,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上与西方国家有质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将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抓手与必然要求”^[17]。新

时代新阶段,我们依靠优秀传统文化的软实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然是一条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这条道路,意味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应对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等复杂的文化冲突中,选择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按照中华民族的理念、生产生活方式,“塑造一种我们民族自己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完善并实现我们民族文化基因中的优良本质,并最终形成我们民族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合理、健全的心性结构。”^[18]

文化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共同价值追求、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理解,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9]优秀农耕文化亦如此,其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和价值追求是乡村振兴的文化资源。中国特色的文化振兴道路,置身于悠久的农耕文明造就的文化沃土中,必然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质,例如追求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倡导自治、德治与法治结合的治理方式,等等。

三、“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的现实困境

现阶段,传承和发展优秀农耕文化,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的历史机遇,也有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提供的政策机遇,还有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的实践机遇,更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的战略机遇。但也要看到,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是一项复杂的、多维度的系统工程。从本质上说,传承发展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农耕文化之间的契合性、源于长期以来优秀农耕文化对于乡村建设的重要价值。从实践上说,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主体认同是前提,用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精神激活优秀农耕文化是关键任务,推进优秀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目标,多样的现代传播方式是手段。从现实情况看,优秀农耕文化在新的时代境遇下面临生存空间萎缩、影响力减弱、创新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传承发展存在诸多困境。

1. 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发展出现认同危机

认同是农民与优秀农耕文化之间的桥梁。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有着悠久农耕历史和灿烂农耕文化。对优秀农耕文化的确认和接受,对农耕技艺、道德传统的认可和遵守,是传承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当前,农民对优秀农耕文化及其传承发展的认同面临着多维度、深层次的挑战,这些挑战交织为父代与子代观念冲突、城乡文化差异、网络话语权缺失等困境,带来一系列问题。

一是时代变迁下不同群体对于优秀农耕文化理解和认同的差异。一般来说,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甚至同一群体内部,往往存在对传统文化理解的差异,例如,“父代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但其对于特定问题的认知依旧迥异于子代。”^[20]认知的差异性直接的后果就是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的内容、模式的差异,从而增加了传承难度。二是逐渐接受城市文化、时尚文化的年轻农民,文化需求趋于多元,他们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家族观念慢慢弱化,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不断累积、传统的伦理关系逐渐淡化,不愿待在农村,对优秀农耕文化产生疏离感,造成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的断裂。三是面对微博、微信、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技术的强大冲击,优秀农耕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从整体看,因数字水平的限制,农民在网络中的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在判断、分析、反馈和解读网络信息方面的能力较差,数字化发展意识薄弱。同时,农民群众网络话语权的缺失,导致他们难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向外传输乡村优秀文化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

2. 激活优秀农耕文化生命力面临困难

从逻辑上说,缺乏优秀农耕文化等乡村传统文化的强有力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定会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危机。由此,激活优秀农耕文化的生命力就成为必然选择。问题在于,如何激活?“激活”一词,根据《辞海》(第七版)的释义,意为“刺激并使其活跃地发挥作用”。这表明激活优秀农

耕文化的过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优秀农耕文化进行全面挖掘,找出其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基因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生命力,以不断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自信与自省、批判与建设、过去与现实等多层面问题,这些问题与当前农村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使激活传统遭遇困境。

优秀农耕文化分有形和无形两部分,有形包括宗族宗祠、农业遗迹等物质部分,也包括民间曲艺、手工技艺等非物质部分;无形既包括农耕社会传承下来的好的风气、民俗、乡规民约等伦理文化和道德文化、也包括农耕技术文化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农耕文化的痕迹逐渐减弱、作用不断被消解。“现代化所到之处,古老淳朴的田园景色、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以及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都被破坏无遗,凋敝的乡村成为城市工业化的牺牲品。”^[21]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以时代的视角重新挖掘和诠释农耕文化的精髓,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同优秀农耕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打造新时代优秀农耕文化品牌,如何立足新时代找到优秀农耕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点,如何以时代精神激活优秀农耕文化的生命力,使之与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契合,以新形式、新的时代内容面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是新时代对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发展提出的重要课题。

3. 推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足

守正创新是新时代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的内在要求和本质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11]。守正创新既强调农耕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的“不变性”,又强调“变化性”;既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在党的领导下传承好优秀农耕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又要求推进优秀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一方面是要对农耕文化中具有时代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另一方面是要对优秀农耕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使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同现实文化相融通。但就目前情况看,优秀农耕文化在“双创”中面临不少问题。

一方面是对优秀农耕文化的表现形式改造不足,趋同化、商业化趋势明显。当前乡村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已然发生变化,农民对农耕文化的认同感逐渐缺失,农村地区的文化氛围淡薄,加剧农耕文化的衰落。同时,有些传统手工艺品制作周期长、较为小众,使得各种传统手工技艺、节庆民俗活动等被抛之脑后。地方政府在推动农耕文化特别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农耕文化形式越来越具有趋同性、商业性。另一方面是优秀农耕文化的内容挖掘不足,向现代转化亟待加强。优秀农耕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多层次的文化体系,除了技术文化在农业生产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外,社会伦理文化、道德文化在多元冲击下走向式微;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存在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从全国范围来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上存在显著差异,优秀农耕文化特色资源开发不足,吸引力不够,并且还常常遭受负面文化冲击。

4. 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形式单一

传统农耕社会中,人们的生产能力、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和社会关系的适应能力以及劳动技术经验的积累,都依赖于长辈的传授,由此形成了尊敬长辈、崇拜权威的文化传统。随之而来的,文化传承方式也主要以地缘、血缘为纽带,以父辈塑造的单向传承为维系手段。时至今日,文化传承方式不断发展和丰富,已不依赖于单一的血缘、地缘、业缘传承,但也远未达到方式多元、手段先进的程度。

一方面传承发展的模式依然是以政府主导下的一元模式为主,难以形成专业人才、政府、农民等多元主体推进模式。优秀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急需依赖治理主体全体参与和共同发力。另一方面传承发展的载体仍较为陈旧。当前,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VR/AR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与数字技术在城市和其他领域的广泛运用相比较,数字技术与优秀农耕文化的融合发展仍较为滞后,数字技术赋能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在系统建构、推进路径等方面依旧存在不少短板,在实践中制约了优秀农耕文化传承的形式。

四、“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选择

新时代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既内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优秀农耕文化相互会通的交往理性,也内含了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价值理性,还包含着坚持问题导向促进优秀农耕文化与时代特征、乡村振兴实践和农民现实生活相融合的实践理性。“第二个结合”既深刻揭示了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深刻揭示了理论发展的根本方法。立足新时代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村实际和党的乡村振兴战略,坚持“第二个结合”,多措并举,是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的必然选择。

1. 坚持以人为本,整合多元主体力量,凝聚共识

归根结底,文化的传承发展是靠“人”来完成的,是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这里的主体作用体现在:首先,文化传承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以实现人民群众更加美好的生活为落脚点;其次,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的传承发展的必由之路就是要唤醒共同记忆,寻求共识和合法性资源,获得人民群众对于该文化及其传承发展事业的认可和共识。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力量至关重要。

优秀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一项需要整合多元主体力量参与的系统工程。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作为劳动主体,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党的领导是激活优秀农耕文化活力的根本保证。新时代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更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守党的文化领导权,加强顶层设计,通过制定合理的文化政策和发展规划,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文化传承提供有力保障。二是农民的主体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22]这段论述从主体力量角度清晰阐明了优秀农耕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立场和推进方法。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农耕文化素养和能力,增强文化自信和传承责任感;通过政策扶持、项目带动激发农民传承和发展优秀农耕文化的热情;通过优秀农耕文化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融入,提高农民的参与度。三是发挥乡贤的传承作用。传统乡村普遍的治理方式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23]可见乡绅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现阶段的农村,乡绅早已被乡贤取代,身份的构成包括农民中的致富能人、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家族族长、村庄管理者等等。这部分群体一般热心农村事务,熟练农业生产技术,深谙乡土人情,才德兼备,在乡邻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和话语权。近年来他们在乡村治理、文化传承、文明乡风、德治等方面贡献颇多。因地制宜地发挥乡贤的作用,也是传承发展农耕文化的重要选择。

2.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优秀农耕文化“双创”,激活生命力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实践的指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4]新时代传承和发展优秀农耕文化,没有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科学理论的指引是不可能实现的。置身当代中国的场域,推进优秀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优秀农耕文化生命力,就是要求做到: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当代文化发展的灵魂。正是因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有今天繁荣生动的局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表达”^[25],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深刻阐明了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的方针原则、价值目标、实践要求、路径选择等问题,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只有始终不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才能保证文化传承发展的道路不偏向,才能保证优秀农耕文化的活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迸发。二是深入挖掘优秀农耕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高度契合的内容,推进文化创新。认真吸收优秀农耕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阐发优秀农耕文化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守望相助、和合友爱、

诚信正义的时代价值,加以继承和发扬。把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农耕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在“第二个结合”方法论指引下,“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确处理真理与文化、传统与现代、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26]用科学方法和人文精神重新解释传统,将传统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转化为现代体系,并以之反思现代化文明,从而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新型农耕文化,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优势、文化优势。

3.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将德治约束与机制完善结合,提升影响力

从根本上说,文化的传承发展依靠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内力是文化以代际传承为主要方式通过频繁接触和自我更新来延续。外力强调通过制度来支持文化传承发展,主要是通过体制机制、行政手段、法律保障等来实现。二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传统农耕文化根植于血缘地缘的人伦关系,是建立在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基础上的,它的延续靠的是风俗教化、乡规民约和世代传承。基于此,从内力角度来看,优秀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依然需要强调柔性的德治约束。一方面培育文明乡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27]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培育良好乡村风气、文化习俗、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即公序良俗的养成,重构新型乡村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弘扬德治传统。以道德为本位的文化传统是优秀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曾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单纯用法律治理,只能使人们畏祸而守法,但不具有道德观念。用道德来教化人民,不仅能使他们守法遵纪,而且能使人具有道德感,知耻从善。孟子也曾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必要性。充分借鉴传统社会治理经验,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是新时代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相较于德治的柔性传承方式,文化的外部制度的作用更为强劲、更有持续性。一是完善优秀农耕文化的研究阐释机制。加强研究阐释优秀农耕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阐明优秀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深入挖掘优秀农耕文化的内涵意义、价值取向、鲜明特色,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能够服务于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二是健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做好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充分挖掘具有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加大对古镇、古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的保护力度。”^[28]当然,同时也要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按照农耕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遗产、传统建筑遗产等进行分类,制定专门的保护规划”,促进农耕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28-29]。三是创建优秀农耕文化融入农民日常生活机制。传承发展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促进优秀农耕文化与时代特征和农民现实生活的融合,即从观念形态落实到民众生活、生存的世界,转化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思想意识、社会心理、行为方式。通过提炼凸显优秀农耕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融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节日活动、乡村旅游等,嵌入农民日常生活。

4. 坚持与时代同行,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创新文化传承发展手段

只有实现传承发展方式从单一化向现代化转变,才能确保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同时发力、同向发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中明确将创新发展数字乡村文化作为数字化赋能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这是基于数字技术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创新文化传承发展手段做出的关键举措。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的线上公共空间完全具备线下农村公共空间所具有的地缘、血缘和文化联结,通过数字技术在优秀文化建设中的运用,能够促使该文化从封闭走向广阔,更能在超越地域限制的状态下,实现乡村与外界资源的交换,文化发展空间得到新的拓展,从而为优秀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

一是出台符合各地实际的数字文化政策,因地制宜创新乡村数字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式。不同地

方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地域特色,在创新过程中应避免千篇一律,盲目商业化,要立足地方实际将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特色文化、地域文化相结合,推动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尤其是地方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乡村文物资源数字化等系列工程。二是利用数字乡村建设盘活优秀农耕文化。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发掘、测绘、建模,建设乡村数字博物馆,将乡村的环境地貌、传统建筑、民俗文化、村史村志等通过网页、APP、小程序等形式呈现,也可以对传统技艺、民俗、方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展示与传播,让人们更多地学习和了解优秀农耕文化。三是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优秀农耕文化产业发展。利用直播平台、电商平台等数字载体,可以让带有优秀农耕文化印记、承载农耕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得到广泛推广和传播,还能进一步带动其转化为特色产品。同时,也可通过线上教学平台和电子学习资源建设乡村数字图书馆,利用互联网和VR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的优秀农耕文化与旅游体验。通过数字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塑造乡村特色农耕文化品牌,营造乡村数字农耕文化新业态。

参 考 文 献

- [1] 教育部高教司,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 肖文光.百年来党以“第二个结合”推动理论创新的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及当代启示[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1-10.
- [8] 耿鹏鹏,罗必良.乡村治理秩序重构:机理与现代化方向[J].世界农业,2024(4):61-71.
- [9]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册)[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0]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2).
- [11]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1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14] 张森.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质与推进思路[J].人民论坛,2023(17):104-109.
- [15] 韩升,王晨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逻辑[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4):9-16.
- [16] 袁祖社.“中国价值”的文化发现及其实践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7(8):24-42,203-204.
- [17] 韩喜平,杨羽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8.
- [18] 袁祖社.文化的实践合理性逻辑与优心灵秩序的生成——马克思文化哲学及其时代启示[J].哲学研究,2022(11):27-35.
- [19]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0] 胡安宁.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化传承:实践——认知图式导向的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20(5):135-155,207.
- [21] 赵兵.农村美化设计:新农村绿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
- [22]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23] 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 [24] 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M].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5] 刘建军,黄梦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10.
- [26] 田鹏颖.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叙事逻辑[J].学术交流,2024(2):5-15.
- [27]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8] 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6-23,162-163.
- [29] 杨鹏,王梓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17-24.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Agricultur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XUE Jinhui

Abstract The excellent agricultural culture carries the spiritual genes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onstitutes a distinct identity and precious wealth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impl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agricultural culture preserve the national memory, inherit and develop Marxist traditional cultural theory, enrich wisdom for rural governance, and highlight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the essential process,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contributes to enriching the cultural life entity of Marxism, facilitating the interac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creating values, and comprehensively exploring the path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world challenges, the process faces difficulties such as a crisis of cultural identity, limited vitality of traditions,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overly simplistic method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a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diverse stakeholders, uphold Marxist guidance to promote cultural innovation, focus o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hile combining moral governance with mechanism improvement, an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by innovating approaches to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second integration; excellent agricultural cultur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陈万红)